



大国学研究文库



Commentaries of Biographies of Talented Scholars in  
Wei and Jin Dynasties

# 魏晋才子传笺证

袁济喜〇编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Commentaries of Biographies of Talented Scholars in  
Wei and Jin Dynasties

# 魏晋才子传笺证

袁济喜◎编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大国学研究文库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魏晋才子传笺证 / 袁济喜编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12

(大国学研究文库)

ISBN 978 - 7 - 5161 - 9591 - 8

I. ①魏… II. ①袁… III. ①诗人—列传—中国—魏晋  
南北朝时代 IV. ①K82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20484 号

---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史慕鸿  
责任校对 季 静  
责任印制 戴 宽

---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46.25  
插 页 2  
字 数 759 千字  
定 价 188.00 元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成果受到中国人民大学“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  
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支持，项目批准号：15XNLG09

## 前　　言

这本书大体上是一本关于魏晋时代的文学人物传记新编。之所以称作《魏晋才子传笺证》，缘起于傅璇琮先生的提议。是接续《唐才子传笺证》与《宋才子传笺证》之后的专著，也是先唐才子传笺证系列中的第一本。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以才情气质为美的年代，才性之辨与有无之辨、言意之辨成为著名的玄学三辨。曹丕《典论·论文》中提出“文以气为主”，更是对于作家个性气质与才情的肯定，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篇中，受魏晋以来“才性论”和曹丕“文气说”的影响，重视“才”和“气”，因为它是“情性所铄”，对作品风格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那么，决定一个人的“才”和“气”的核心又是什么呢？是“志气”。刘勰说：“才力居中，肇自血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他在《才略》篇中指出：“宋来美谈，亦以建安为口实。何也？岂非崇文之盛世，招才之嘉会哉？”最后赞曰：“才难然乎！性各异禀。一朝综文，千年凝锦。”刘勰极为重视才略在文学发展中的作用。因此，从才子传角度去整理与研究魏晋南北朝作家与作品，确实是一个历久弥新的模式。

魏晋南北朝文学一直是中国文学研究中的重点，晚近以来，更是成为热门。研究的模式，既有传统的文献整理，也有现代西方输入的文学学科的论著模式。如何借鉴中国传统的研究模式，与现代学术理念与方法相融通，有着许多值得探索的地方。采用元人辛文房的《唐才子传》的路数进行研究，是傅先生所开拓的古今会通的一种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模式。傅璇琮先生在《唐才子传》的基础之上，踵事增华，编著成《唐才子传笺证》、《宋才子传笺证》，获得成功，得到学界的认同。

关于这种笺证体的研究模式，傅先生总结出了三条：（一）探寻材料出处；（二）纠正原书所记史实错误；（三）补考原书未备的重要事迹。

除此之外，傅先生还强调现代学术规范的笺证方式，科学地集中和概括作家生平事迹研究的成果。我认为，除此之外，从古今会通的角度来说，可以通过原始材料与现代考证的结合，剔除那些不实记载，加入最新的研究成果，提供研究信息，同时融入作者自己的研究观点与理论思维。司马迁说他写作《史记》“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唐才子传笺证》与《宋才子传笺证》，则较好地印证了这一点。

我认为，将这种模式引入先唐文学研究领域，同样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魏晋文学作为先唐文学发展时期的中古阶段，处于由上古向隋唐之后转变的关捩，文学家与文学作品的史实记载远未达到唐宋元明清时期的丰富，处于先秦两汉文学向后期演变的过渡阶段，许多史料有待勘证与更正，对于其解读与阐发，需要作者的理论识见与考论。因此，将原始文献与现代考论融为一体的新唐才子传笺证模式，应当说，是一种较为有效而便捷的模式。所以，当2010年傅先生提出让我主编一套《先唐才子传笺证》时，虽然当时本人面临着繁重的行政与教学科研任务时，还是允诺下来，与清华大学的孙明君教授分别承担了《魏晋才子传笺证》、《南北朝才子传笺证》的编著工作。

这种模式在先唐时期较六朝之后，更具有价值与意义。理由是：（一）魏晋才子传史料，正史中主要出自西晋陈寿的《三国志》与唐代房玄龄编修的《晋书》，以及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但是陈寿《三国志》中的文士资料，许多是依赖后来的裴松之的注解而得以发现。比如阮籍、嵇康的传记资料，主要保留在《三国志》中《王粲传》裴松之的注解中。这说明关于竹林名士的记载，在陈寿编著《三国志》时就语焉不详，幸亏有了裴松之的注解而得以流布。所以现在我们编著《魏晋才子传笺证》，可以依据后人与今人的发现，镶嵌进去许多新的史实与材料，借以补充史料与纠正前人的讹误。（二）初唐房玄龄招集文士所编修的《晋书》中关于文学家的记载，大都采用《世说新语》与梁代刘孝标的注，将笔记小品中的许多传闻作为信史来记录，这就更需要后来的笺证者作辨析与订正。（三）魏晋时代的许多文学家，自古以来就聚讼纷纭。而魏晋人又喜欢拟古与作伪（见王瑶先生《中古文学史论集》中《拟古与作伪》一文），通过笺证的方式，可以对此作出辨正与论述，提出研究者自己的观点。我自己在《汉末三国两晋文学批评编年》中采用的就是这种将编年与论证融为一体的方式，也获得了学界的认同。所以，通过笺

证体来对魏晋才子传作出新的考论，可以得到许多新的收获。

因此，本书的写作基本以《后汉书》、《三国志》、《晋书》、《资治通鉴》等正史记载作为基础，融合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再加上作者的观点，组成笺证的主体部分，间或加入一些文献与研究的信息，以供检索之便，重要的人物每篇后附有相关参考文献。一般的文学人物单独列传，个别人物由于史料欠缺则并传，借鉴钟嵘《诗品》的做法。

另外，在编著时，感觉不少问题还有待解决。最大的问题便是，元人辛文房的《唐才子传》中的“才子”概念与范畴，是指科举制度下的产物，唐代科举以诗赋取士，因此，士人欲入仕途，诗赋为必不可少的功课。因此，科举与唐代文学是重要的研究内容。魏晋时代则是门阀士族左右社会与政局，文学创作也受制于士族群体及其文化形态，士族与文士趋于一体化，他们与唐宋以来的科举制度下的才子身份与文学心态并不完全相同，当然，在崇尚个性才华方面，有时更甚于唐宋统一皇权形态下的文士。所以，我们在界定与选取魏晋才子时，颇费周折与心思。我们大体是这样考虑的，魏晋才子的概念基本定位于“文学人物”这一领域，因此，举凡在文学创作上有成就的人物，便可收入其中，而无论其身份与地位。曹操、曹丕、曹植等帝王也收入其中，如果这样重要的文学人物不收入，那么这本魏晋才子传的范围便会很有限。况且魏晋时代也没有纯粹的才子文士这类人物。既然本书冠之以“才子传”，适当的扩容也是可以理解的，当然，将曹操及其儿子们纳入才子传的范畴确实有些勉强，但实出无奈。当初本想就此类问题集中向傅璇琮先生求教，而未及讨教，傅先生遽尔离世，思之怃然。傅先生对于此书的写作与出版十分关心，经常催问，对于发表在《郑州大学学报》上的《嵇康传笺证》等三篇作品，充分肯定，同时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本书的出版，凝聚着傅先生的心血，也是对先生的告慰。

这本书是我们师生之间合作的结晶。由我撰定体例，然后大家分工写作。国学院的教学注重师生互动，实行导师制，有许多读书班，大家在读书的同时，承担学术项目，通过魏晋才子传笺证这种写作方式，既让学生学会了如何阅读与辨正原始文献，又锻炼了理论思维。同时为他们学位论文的酝酿打下了基础。全书由我确定写作体例，制订写作要求。参加写作的有博士生黎臻、高丹、杨康、李小青、徐晓，硕士生刘睿、刘安妮等，我作了最后的修改与定稿。这项工作从开始到定稿，已有四年了，其中有

4 魏晋才子传笺证

些学生已经获得学位，毕业参加工作了。回想讨论时师生之间其乐融融、教学相长的情形，令人感慨。至于此书的不足之处，也希望得到各方的指正。

本书作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大国学研究文库”的一种，能够将这项彰显国学院特色的成果奉献各方，也是一种荣幸。衷心感谢各方对于此书问世所作的努力。

2016年5月2日于北京南郊寓所

# 目 录

前言 ..... (1)

## 第一编 汉末三国

曹操传	(3)
曹丕传	(20)
曹植传	(40)
孔融传	(63)
陈琳传	(79)
阮瑀传	(89)
徐幹传	(96)
刘桢传	(104)
王粲传	(113)
应玚、应璩传	(129)
邯郸淳传	(139)
荀悦传	(145)
王朗传	(150)
刘劭传	(159)
祢衡传	(166)
杨修传	(171)
吴质传	(177)
蔡琰传	(183)
繁钦传	(188)

何晏传	(192)
阮籍传	(203)
嵇康传	(220)
刘伶传	(245)
向秀传	(252)
钟会传	(262)
王弼传	(273)
诸葛亮传	(290)

## 第二编 西晋

皇甫谧传	(311)
傅玄传	(323)
张华传	(335)
陈寿传	(353)
何劭传	(362)
傅咸传	(368)
挚虞传	(374)
夏侯湛传	(384)
潘岳传	(392)
石崇传	(418)
左思传	(428)
张载、张协、张亢传	(440)
裴徽传	(452)
郭象传	(459)
欧阳建传	(467)
陆机传	(471)
陆云传	(488)
刘琨传	(506)

### 第三编 东晋

郭璞传	(523)
葛洪传	(534)
干宝传	(545)
李充传	(552)
庾阐传	(564)
王羲之传	(572)
曹毗传	(583)
孙绰传	(590)
支遁传	(598)
习凿齿传	(614)
袁宏传	(623)
戴逵传	(635)
王嘉传	(644)
张湛传	(649)
慧远传	(655)
顾恺之传	(669)
殷仲文、殷仲堪传	(676)
谢混传	(687)
湛方生传	(696)
陶潜传	(700)
郭澄之传	(719)
 参考书目	(726)

## **第一编**

---

### **汉末三国**



## 曹操传

曹操，字孟德。一名吉利，小字阿瞒，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人。生于汉桓帝永寿元年（155年）。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太祖武皇帝，沛国谯人也，姓曹，讳操，字孟德。”裴松之注：“太祖一名吉利，小字阿瞒。”《魏氏春秋》：“武王姿貌短小，而神明英发。”《水经注》卷二十三：“（谯）城东有曹太祖旧宅，所在负郭对廛，侧隍临水。”

关于曹操生年，以《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载建安二十五年（黄初元年）卒年六十六推之，当生于永寿元年。

有关曹操祖先情况，古有三说。其一，《三国志·魏书·蒋济传》记载：“初，侍中高堂隆论郊祀事，以魏为舜后，推舜配天。”曹叡《郊禘诏》亦有“以祖帝舜配”之语，可知曹氏可能出自帝舜。其二，《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注引王沈《魏书》：“其先出于黄帝，当高阳世，陆终之子曰安，是为曹姓。周武王克殷，存先世之后，封曹侠于邾。”蒋济《立郊议》引《曹腾碑文》：“曹氏族出自邾。”《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裴注：“邾，曹姓，魏亦曹姓，皆邾之后。”皆反对魏出自虞舜之论断，认为曹氏出于黄帝。其三，《三国志·魏书·蒋济传》裴注：“魏武作《家传》，自云曹叔振铎之后。”曹叔振铎姬姓，周文王之子，周武王之弟。按：姬姓祖乃轩辕氏，《蒋济传》裴注载曹叔振铎姬姓，即与王沈《魏书》所言曹氏始祖乃轩辕黄帝相合；而邾姓亦可能源于姬姓，今已不可详考。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操）汉相国参之后。桓帝世，曹腾为中常侍大长秋，封费亭侯。养子嵩嗣，官至太尉，莫能审其生出本末。嵩生太祖。”曹嵩来历未明。裴松之注：“吴人作《曹瞒传》及郭颂《世

语》并云：嵩，夏侯氏之子，夏侯惇之叔父。”梁章钜《三国志旁证》卷一：“何焯曰：夏侯惇之子楙尚清河公主，渊子衡亦娶曹氏，则谓嵩为夏侯氏之子者，敌国传闻，盖不足信。”又卷十引赵一清：“至操以女妻懋，盖欲掩其迹，所谓奸也。而或转据此力辨操非携养，不亦慎乎！”对此，陆侃如考证：“事实上携养的本是嵩而不是操，嵩的携养也并无人否认，问题只在嵩是夏侯氏之子，抑另一姓之子。夏侯氏‘一门侈盛于时’（《魏书·夏侯渊传》注引《世语》）确是事实，所以吴人传说也有些根据。《武帝纪》裴松之注：“司马彪《续汉书》曰：腾父节，字元伟。”侯康《三国志补注续》‘案《后汉书·皇后纪》曰：献穆曹皇后讳节，魏公曹操之中女也。此书三《少帝纪》曰：景元元年六月故汉献帝夫人节薨。若腾父名节，操不应复以名其女。陈少章谓：《艺文类聚》引《续汉书》，曹腾父萌（案在九十四卷）。与裴注异，恐当以裴为正。又考《御览》一百三十七卷引《续汉书》曰：孝献皇后名宪。则是本不与腾父同名。（《后汉书》以宪为操长女，节次女。）诸说差互，未知孰是。’梁章钜《旁证》卷一：“若腾父名节，操不应复以名其女矣。《艺文类聚》卷九十四兽部引《续汉书》：曹腾父萌。节萌字形相近，或本作萌而误作节软？”操三女均为贵人，后立中女节为后，史有明文，故腾父当以名萌为是。”《中古文学系年》其论可从。

曹操母丁氏。《三国志·魏书·文帝纪》：“黄初元年……五月戊寅天子命王追尊皇祖太尉曰太王，夫人丁氏曰太王后。”

### 少机警，任侠放荡。有樵水击蛟的传说。

《世说新语·假谲》：“袁绍年少时，曾遣人夜以剑掷魏武，少下不著。魏武接之，其后来必高；因帖卧床上，剑至果高。”

是篇又记载：“魏武少时，尝与袁绍好为游侠。观人新婚，因潜入主人园中。夜叫呼云：‘有偷儿贼！’青庐中人皆出观，魏武乃入，抽刃劫新妇；与绍还出，失道坠枳棘中。绍不能得动，复大叫云：‘偷儿在此！’绍遑迫自掷出，遂以俱免。”刘孝标注引《曹瞒传》：“少好谲诈，游放无度。”又引孙盛《杂语》：“武王少好侠，放荡不修行业。尝私入常侍张让宅中，让乃手戟于庭，逾垣而出。有绝人力，故莫之能害也。”

陈寿《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载：“太祖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也。”裴注引《曹瞒传》曰：“太祖少

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其叔父数言之于嵩。太祖患之，后逢叔父于路，乃阳败面咽口；叔父怪而问其故，太祖曰：“卒中恶风。”叔父以告嵩。嵩惊愕，呼太祖，太祖口貌如故。嵩问曰：“叔父言汝中风，已差乎？”太祖曰：“初不中风，但失爱于叔父，故见罔耳。”嵩乃疑焉。自后叔父有所告，嵩终不复信，太祖于是益得肆意矣。”

梁章矩《三国志旁证》卷二：“又刘昭《幼童传》云：太祖幼而智勇。年十岁，尝浴于谯水，有蛟逼之，自水奋击，蛟乃潜退。于是浴毕而还，弗之言也。后有人见大蛇奔退，太祖笑之曰：‘吾为蛟所击而未惧，斯畏蛇而恐耶！’众问乃知，咸惊异焉。”今日看来此事过于离奇，不足为信，暂于此录之。

汉灵帝熹平三年（174年），曹操举孝廉，为郎，除洛阳北部尉，上书理窦武陈蕃。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年二十，举孝廉，为郎，除洛阳北部尉。”

《世说新语·方正》：“南阳宗世林，魏武同时，而甚薄其为人，不与之交。及魏武作司空，总朝政，从容问宗曰：‘可以交未？’答曰：‘松柏之志犹存。’”刘注引《楚国先贤传》：“宗承字世林……魏武弱冠，屡造其门，值宾客猥积，不能得言，乃伺承起，往要之，捉手请交，承拒而不纳。”

《世说新语·识鉴》：“曹公少时见乔玄，玄谓曰：‘天下方乱，群雄虎争；拨而理之，非君乎？然君实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恨吾老矣，不见君富贵，当以子孙相累。’”刘注引《续汉书》：“初魏武帝为诸生，未知名也，玄甚异之。”又引《世语》：“玄谓太祖：‘君未有名，可交许子将。’太祖乃造子将，子将纳焉。”又引孙盛《杂语》：“太祖尝问许子将：‘我何如人？’固问，然后子将答曰：‘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太祖大笑。”从弱冠及为诸生的话看来，事当在举孝廉时。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注引《魏书》：“先是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谋诛阉官，反为所害。太祖上书陈：‘武等正直而见陷害，奸邪盈朝，善人壅塞。’其言甚切，灵帝不能用。”按，武、蕃建宁元年被诛，时操十四岁，依理不能上书，上书应在做洛阳北部尉后。

熹平六年（177年），曹操迁顿丘令。明年，免官。又明年，纳卞氏。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注引《曹瞒传》：“太祖初入尉廨，缮治四门，造五色棒，县门左右，各十余枚。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后数月，灵帝爱幸小黄门蹇硕叔父夜行，即杀之。京师敛迹，莫敢犯者。近习宠臣咸疾之，然不能伤；于是共称荐之，故迁为顿丘令。”

《三国志·魏书·陈思王传》：“太祖征孙权，使植留守邺，戒之曰：‘我昔为顿邱令，年二十三；思此时所行，无悔于今。’”

裴注又引《魏书》：“太祖从妹夫灤彊侯宋奇被诛，从坐免官。”陆侃如认为曹操免官与迁顿丘令同年；张可礼则认为其事在迁令顿丘一年后（光和元年）。张可礼《三曹年谱》认为：“梁章钜《三国志旁证》卷一：‘按，宋奇之封，不见于《后汉书》，熊方补表亦未载。考《后汉书·后纪》，灵帝宋皇后父鄧封不其乡侯。光和元年，后废，鄧父子并被诛，则灤彊侯必为宋皇后兄弟行也。’”今从张说。

曹操免官归谯后，于光和二年纳卞氏。《三国志·魏书·卞后传》：“年二十，太祖于谯纳后为妾，后随太祖至洛。”

汉灵帝光和五年（182年），曹操拜议郎。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征拜议郎。”裴注引《魏书》：“后以能明古学，复征拜议郎……是后诏书敕三府举奏州县政理无效，民为作谣言者，免罢之。三公倾邪，皆希世见用，货赂并行。强者为怨，不见举奏，弱者守道，多被陷毁。太祖疾之，是岁以灾异博问得失，因此复上书切谏，说三公所举奏专回避贵戚之意。奏上，天子感悟。”侯康《三国志补注续》：“《后汉书·刘陶传》：光和五年陈耽与议郎曹操上言云云。《通鉴考异》曰：耽时已为司徒，不应与议郎同上言；王沈《魏书》曰，太祖上书切谏，不云与耽同。是温公不取范史而取《魏书》也。”曹操曾两为议郎，第一次在免顿丘令后。陆侃如将此事定在光和五年，因为诏举谣言是在本年，与孔融陈对同时；而张可礼认为曹操第一次拜议郎是在光和三年，因《灵帝纪》光和三年六月有诏公卿举能通《尚书》、《毛诗》、《左氏》、《穀梁春秋》各一人除议郎事，故疑在光和三年六月前后除议郎，此推证据似显不足。今从陆说。